

一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之作

——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

何炼成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是近年来刚刚兴起的崭新学术研究领域，也是一门崭新学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来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的中国部分，是马列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过程史与发展史；从中国经济思想史来看，它是中国古代与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必然接续与延伸，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现代主体部分；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来看，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重要国别部分，而且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素材史与理论准备史，即正在建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史。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及其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继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之后，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王毅武副研究员在多年潜心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一部自己的新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目前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之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学术价值。该书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领域，填补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重要空白。

对于任何一个新学科来说，研究的对象、任务与方法首先是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是研究并阐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这一新学科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基本内容的理论归纳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过程中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及创新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形成与发展、丰富的历史轨迹，科学地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断丰富、发展与创新的过程，即中国化的过程，同时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结论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形成

过程。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不仅要科学地说明上述基本问题，而且还要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同时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这里，从研究对象的规定引伸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基本任务。应当说，作者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与基本任务的确定，是客观的、正确的。从目前看，系统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学术成果尚无。在这种情况下，要写出一部史论有机结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且不论《研究》一书能够在学术上取得多么大的成功，仅作者不畏艰辛、奋力攀登、敢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就值得充分肯定和衷心赞誉。

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一部学术著作有无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在研究方法上有无创造性的见解与突破。作者在《研究》一书中强调，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与规律。“如果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自己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科学理论比喻为‘金子’的话，那么，获取这些理论的科学方法，则是‘炼金术’。相对来说，方法往往比理论更加重要。”作者提出，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因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根本方法时，又具有若干具体形式。”《研究》一书具体地将其表述为“过程法”、“分析法”和“比较法”。这些研究方法，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虽然也有论述和运用，但作者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对象特点及基本要求，联系实际，有血有肉地论述了如何运用这些研究方法，以及在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是

有创造性的，因而也是有成效有贡献的。这样，客观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如何在中国具体化的；是如何按照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去运用和发展的；它在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可以总结出一些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来；等等，也就有了方法论基础。由此，通观全书，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新领域，建立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门新学科，是《研究》一书的宗旨。遵循这一宗旨，该书除绪言外共分3篇21个题目，从学科、专题、人物三个主要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新领域、新学科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系统的研讨。作者不是一般性地阐述学科自身的基本内容，而是侧重于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因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该学科及其基本理论的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在“学科论”中，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主线、特点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尚属首次，具有开拓性。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发端应当始自“五四运动”，并应以此界定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的分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可划分为孕育、产生、过渡、发展、挫折和创新等六个时期，每个发展阶段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小的阶段；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与争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主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可概括为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与创新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生命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特点，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为过程性、综合性、介绍性、评论性及预测性；等等。这些认识与观点都是很有新意的见解，在学术

研究中都是第一次阐发。

在“专题论”中，作者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若干重要方面，诸如“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意义等，首次进行了历史考察，很多见解不仅是独到的，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在论述一些基本问题的同时，作者还对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一些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经济理论中的某些不足所发表的意见，富有见地、具有启发性。例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专题中，作者提出“只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大基本生产要素的所有不同一，就必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种所有状况不同一的生产要素的不同结合方式，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上商品经济的不同性质。”作者还认为“劳动还是个人谋生的手段”这一命题实际上“暗含着劳动力的个人所有”，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性的原因，亦是按劳分配的直接因素：“计划性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宏观实现形式”。“‘计划规律’不过是价值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派生规律’”，“市场是社会化商品经济的载体”，“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等等。所有这些认识，从时间上看，都是在1986年以前，因而可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在“人物论”中，作者对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周恩

来、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邓小平、陈云等以及著名经济学家如孙冶方、马寅初的经济思想的方法、实质、核心、主题、特点等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例如，作者认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核心是对于“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探索；周恩来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题是“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刘少奇经济思想的基本特点：注重经济理论的修养、提倡经济工作民主、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等。这些归纳与概括，都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有创见，有新意，有高度，观点鲜明，论述严谨。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一书注重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研究与评论相结合，文风朴实，表述流畅，既有理论与学术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干预意识与现实意义。正如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叶世昌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所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特别令人瞩目”；这部新著“对一些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拓了中国思想史的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空白，是值得庆贺的”。概括《研究》一书最重要的特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贵在开拓，贵在创新。

在此还要提及的是，《研究》一书可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王毅武主编，下称《简编》）的“姐妹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简编》出版后，受到经济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我也曾写了《集开拓与探索于一书》（见《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的评论，给予了“三个第一”的评价。该书先后荣获北方15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江西省

经济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新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虽然《研究》与《简编》都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专著，但从宗旨、结构、基本内容到研究方法都是不同的。《简编》主要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为基本内容，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大体过程与理论线索；而《研究》一书则侧重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研究与学科建设，强调专题理论研究的渊源关系与基本脉络，对一些代表人物的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两本书虽然在某些内容上有所交叉，但论述的角度和所要说明的问题却又是大不相同的。对于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来说，如何把学科、专题与人物的研究有机地紧密地结合起来，相当完美地融为一体，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但《研究》一书已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地尝试，领先了一步。无论其是否精当，也无论其是否成熟，仅就其大胆开拓与探索而言，就已经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确实令人称道。

还应该强调，在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了这部分，中国经济思想史才有了完整的体系。同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又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相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而自成系统。当然，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也是如此。所以，《简编》和《研究》二书对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也都是有重要贡献的。

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绝非“剪刀加浆糊”就可以完成。其实，在这一研究中，不懂近代中国

和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就无以把握有关经济思想及理论的环境、作用与意义；不了解这一时期乃至以前更长时间经济思想发展的总况及脉络，就无以概括或评价所研究内容的历史地位与理论功能。当然，资料方面的难度，加之作者在书中所特别指出的两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即“现在系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时尚早，局限性太大”与“所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中文本’，并没有什么自己的独创或‘新鲜货’”，都给这一研究带来了较多的困难和障碍。此外，一些人所提倡并遵循的“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主张，也给这一研究从客观上造成了颇多不利因素。应当承认，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实事求是地指出某些权威性人物的经济思想、理论、学说的缺陷、矛盾甚至谬误，比起肯定或褒扬他们的经济思想、理论、学说要困难得多，有时甚至可能要冒风险，特别是在经济理论评论不怎么兴盛的情况下就更有难度了。正因如此，《研究》一书的问世，不仅更加显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功力，而且还切实体现了作者值得赞赏的学术勇气。

正如金无足赤一样，《研究》一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如资料的困难所引致的某些概括不够完整；首次尝试所难免的个别评论未必周全；专题研究还有待拓宽；人物研究还需进一步铺开等，这些缺点或不足，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会得到补充与完善。总的说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需要有志于此的经济理论工作者继续奋力开拓，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这枝含苞待放的花朵，使之以自己独特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自立于学术之林。

我相信，这将是现实！

（责任编辑 王雪松）